

2027/100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美〕柯文 著
林同奇 译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李丹慧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美〕柯文 著

林同奇 译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9 1/8印张·166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4201—7200册 定价：14.00元

ISBN 7—101—00123—8/K·52

中文版前言

我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其目的的一则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从一开始我就假定并非所有美国的中国史专家都会同意我的所有观点——此假定已为第一批书评所充分证实。同时我还假定我所作的估量其总体上将得到广泛支持——我高兴地发现此假定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林同奇教授在1985年春向我提出翻译此书时，我既感荣幸又颇担心。感到荣幸的缘故，自不待言。感到担心的原因，则应作些解释。主要是当初我把原作看成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谈话”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谈多年，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我不知邀请一位新知参加此番谈话结果将会如何。我知道我和中国史家对于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家应如何研究历史，在某些基本假设上存在分歧。这一点我倒并不犯愁。我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

·无需赘述，经过长久的反复思考，我终于打消疑虑。首先，我进

一步体会到在过去十年内，中美两国的中国史研究者的关系已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当我于七十年代后期着手撰写此书时，两国史家还生活在彼此完全隔离的世界里。1977年春我首次访问中国时，还没有一位中国史家在美国从事研究，也没有任何美国史家在中国进行研究。我们彼此不读对方的著作，甚至也互不了解姓名和工作机构。这种情况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变化，而且此后变化之快及其程度之深实足令人惊愕。在我1986年春写此前言时，已有成百的中美中国史专家在对方的国家里进行过或长或短的研究。彼此交谈，一起参加专业会议，在同一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甚至其中有些人，尽管彼此观点分歧，却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总之，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离了。

打消我有关中文版疑虑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翻译进展中，我越来越感到我遇到了一位理想的翻译者。林同奇教授不仅对英语异常熟谙，而且酷爱历史，尤其是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他总是把优秀译作的两个标志，即既要忠于原文，又要使译文清晰流畅，铭记在心。本书的内容究竟有多少能使中国读者感到有用并引起他们的兴趣，尚待事实证明。但是，幸有林教授的翻译功力，中国史家至少会懂得我所说的话了。

如果让我今天重写此书，我得坦率地说，就原有的论证而言，我不会作很多变动。不过，在最后一章讨论近年美国历史研究之趋势时，我定会提到本书出版以来几部比较重要的专著。其中我尤其会想到下列四部：马德林·齐林(Madeleine Zelin)的《县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威廉 T. 罗 (William T. Rowe) 的《汉口：中国一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本杰明·A. 埃尔曼 (Benjamin A. Elman) 的《从哲学到训诂学：帝制晚期之中国在思想与社会方面的变革》(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齐林的书探讨了十八世纪中国国家本土固有的演变过程，尤其侧重财政改革。罗的著作探索了十九世纪汉口商业的巨大发展。埃尔曼的著作讨论了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中国思想领域某些重大变化。黄的书(其中文版已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描绘了帝制晚期与民国时期中国农业长期变化的模式。

这些著作中有三部(齐林的、黄的和罗的)是以在中国进行的档案研究为部分依据的，因此都直接证实了十年来中美交流的巨大进展。四本书都是探讨在十九世纪西方全面入侵之前，或在此之外，中国所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因此这些书令我高兴地支持了我在自己著作中详细发挥的命题，即倘想正确理解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需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最后，我对中华书局编辑们赞同此书与中国读者见面，表示衷心感谢。我期待听到中国同行们的反应，热切希望他们不吝赐教，

以促进我们共同的事业,即增进对中国过去的了解。

柯 文

1986年4月写于波士顿

译者代序 “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

林 同 奇

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七十年代前受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与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人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界经过1964—1974年越南战争至水门事件风雷岁月之震动,部分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上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这一史学界动向,柯文称之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或译为中国中心取向)。它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七十年代以来研究亚、非、中近东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总趋势,即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从社会内部按照这些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与此动向同时崛起的另一动向,是力图以帝国主义这一历史范畴作为探索1949年前全部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这两种七十年代兴起的潮流同时对流行于五

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以费正清、李文森为代表的模式提出挑战,但彼此之间又相互批评,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纵横交错的局面。在目前美国史学界中前一种趋势有逐步扩展之势,而柯文此书则是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此趋势作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卅五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几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1〕}

对中国读者说来,这本书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是情报价值,它较全面地介绍了战后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成果与趋向。全书四章先后着重讨论了近代中国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涉及的美国当代史家、学者一百二十余人,对其中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详细评介。每章附有注解,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文献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作者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对各种有关论点进行分析批判,使本书带有较浓厚的思辨色彩,给处于深刻反思中的我国史学界提供了一定思考素材,具有启发思路的价值。书中介绍了美国史家对我国近代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论点,其中不少与我国史家有明显分歧,例如:有的美国史家认为帝国主义对十九世纪我国经济全局的作用不仅十分有限而且是良性的;有的把辛亥革命主要看成是一场比较保守的地方绅士阶层与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具有改革倾向的清政权之间的冲突;有的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不是鸦片战争而应推前到十八世纪乃至更早时期;有的则贬低太平天国、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的进步作用。其中一个比较核心的分歧是如何恰当估量西方入侵对我国近代历史产生的一系列冲击作用。这些看法,以及另外一些难为我国史家接受的想法,即使有偏颇之弊,亦可触发思绪,促进探索,不为无助。对这些具体论点译者不拟也无力详加分析,只好留待我国专家作出回应。本文准备详细讨论的是书中提出的比

较理论性的问题,即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上的涵义。

柯文在第四章,即最后一章才正面阐述了中国中心观的具体涵义,但这一取向却是贯穿全书的主轴,并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渊源。柯文在书中只集中描绘中国中心观与实际的史学研究工作直接有关的主要特点,对其中某些理论性的前提则多半未加阐发或根本隐含不言。本文拟集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在简要介绍本书主要论点之后,本文将集中从方法论与认识论角度描述中国中心观的特色,寻究它所反映的史学思潮,分析其内在张力。必需指出的是柯文曾明确提醒读者中国中心观本来就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它“只是一组趋向,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尽管为了方便起见我仍称之为取向)”(P. 135)。因此本文对中国中心观内在矛盾的揭示不少地方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探索。译者希望通过这些探索,可以从比较广阔的视野对中国中心观的本质有较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中窥视美国当前史学思潮的某些动向。

三种西方中心模式与中国中心观

柯文在序言中开宗明义点出全书主题,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序言 P. 1)接着他以四章篇幅从正反两面阐述这一主题。

前三章分别批判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1)“冲击一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模式认为在十九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

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2)“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模楷”(norm)，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3)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柯文认为这一模式和前面两种模式实质上同属“西方中心模式”，因为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因此它们都认为十九、廿世纪中国所可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狭窄的死胡同。

针对这一弊端，柯文在本书最后一章(第四章)正面提出“中国中心观”，并把这一看法的特点归纳为四：“(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P. 165)柯文强调指出,这一“中国中心观”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完整的严密的方法论体系,而是七十年代初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日益明显的趋势,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此趋势作出系统的明确的描述而已。

批判的锋芒与对历史独特性的追求

中国中心观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持续有力的批判锋芒。在批判冲击一回应模式时,柯文集中讨论了与西方冲击关联较大的历史事件,证明该模式即使在本应完全适应的范围内也是失灵的。在攻击传统—近代模式时,他改变策略,追溯思想渊源,上至十九世纪,然后描述这一模式在战后的演变过程,最后指出该模式本身的致命弱点,批判的逻辑相当严谨。他对帝国主义模式的批判,在理论上弱点较多,但是援引了相当数量的文献,批评了认为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想法,有些论点有待我国近代史研究者作出回答。

但是,译者认为柯文展开这一系列批判的根本依据是他深信不同的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同,表现的形式也互异。换言之,他深信历史发展的歧向性,强调历史统相的独特性。这点可以从他批判狭隘主义(parochialism)与历史发展目的论(teleological change)⁽²⁾中得到证明。如果说柯文对狭隘主义的批判是从共时性(或空间)上否定了历史现象重复出现的可能,对目的论的批判则从历时性(或时间)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从表层上看柯文的批判锋芒是指向西方中心论,但是其实质是指向所有肯定历史现象具有重复性或共性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柯文认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框架必需按照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特性,单独设计。否则必将限制、遮蔽研

究者的历史视野。在柯文看来,中国中心观批判的三种传统模式,正是由于采取了预先制订的框架,终于使史家的视野局限于一定的历史现实而忽略了另一部分历史现实。例如他认为冲击—回应模式由于集中探讨预先设定的问题,即“中国为何没有较早地更有力地对外国侵略作出回应?”从而就很容易地“忽视了某些重要事变,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P. 133)传统—近代模式由于采取了传统与近代的两分法,就“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照两极来划分”,排除了人类经验中某些极为重要的领域,仅仅因为一时无法认定它们到底是属于“传统的”还是属于“近代的”。(P. 76)我在下文将讨论柯文对理论框架的看法的弱点。这里我想指出的则是中国中心观强调分析框架的独特性,这有助于清除遮蔽史家视野的条条框框,开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心观对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起了真正的解放作用,其批判锋芒是相当尖锐的。

但是,正是柯文这种对历史独特性的追求,同时又又在一定程度上顿挫了他的批判锋芒。这是因为为了尽量适应历史现象的独特性,柯文感到不能把史家使用的理论框架的内容订得过度过死,它必需能容纳不同社会、文化可能具有的不同特点,必需兼收并蓄,并避免固定成形。罗伯特·马克思(Robert Marks)曾批评“中国中心”这一概念“软绵绵地像海绵一般”(spongy),他说:“中国中心观可以意味着用儒家概念解释中国历史,也可意味着用中国农民的价值观或任何其他理论框架来解释它。”^[3]柯文可以申言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早就提醒读者中国中心观“并不是某种单一的界限分明的取向”,而只是“一组趋向”。但是从更深一层着眼,由于这种“软绵绵”的状态无形之中来自他对历史特殊性的执着的追求,这个弱点——它在柯文看来可能是一个优点——是不可避免

的，它是柯文的整个历史思维逻辑的结果。

动态观点

中国中心观一个值得赞扬的特点，是它的动态观点。我指的是它强调历史发展中对立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现象。在这点上他的看法与我国史家所强调的“对立面统一”颇为相似。我想摘引书中一些章句说明此点。在总结他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批评时，柯文说：“‘西方冲击’的概念，可以恰当地表达‘首次相撞’的含义，但它对于相撞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效果却很少探究。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坚持把‘中国回应’这个概念和首次‘西方冲击’过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也不会有太多帮助。如果一定要保留这些概念，则必需把注意力灌注于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P. 42)在批驳传统—近代模式时他引用了美国史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话，认为“人类过去的各方面经验，不论有益有害，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并认为“中国之‘过去’和‘近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PP. 64—65)它们是“两种流动不居、互相渗透的状态，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了传统的特点”。(P. 76)柯文批评了J. H. 赫克斯特(J. H. Hexter)称之为“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这种假设认为“社会能量向一级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之能量”。(P. 77)他同意美国史家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墨子刻(Thomas Metzger)的看法，认为“革命变化的净增有可能和信奉旧价值观念的加强同时进行”。(P. 77)总之，中国与西方，冲击与回应，过去与现在，传统与近代，尽管在理论上是对立的范

畴,但在历史的现实中却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通过这种动态的灵活的机制,史家就有可能对错综复杂、流动不居的过去的人类经验做出比较忠实的描述。

历史描绘的精细化

柯文列举的中国中心观的四个特征中有两个——即把中国按“纵向”与“横向”加以分解的作法——都是为了对中国近代史作出比较精细的描绘。因此,贯穿全书,柯文特别强调“区分”(differentiation)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区分才能对中国历史现实取得一幅纹路细密、轮廓分明的画面。这种倾向本来是和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兴起的所谓“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复杂性”,“重新察觉历史动力的多样性”的思潮相一致的。^[4]但是经过柯文反复强调,极力倡导,它成了中国中心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柯文正确地指出“把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以平均。这种做法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在最坏的情况下,由于我们鲁莽草率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很可能把现实完全歪曲了”。(P. 7)因此他十分赞赏谢尔曼·科克伦(Sherman Cochran),因为他在估量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作用时,把“帝国主义剥削”区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P. 127)描绘的精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我国近代史研究多数仍集中在中央或高层人物的活动和全国性的单位。美国史学界这一趋势值得我们重视。

但是,译者认为,柯文在强调“区分”的同时,低估了“综合”(integration)的重要性。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低估了总框架,或者借用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名词,即“图式”(schema),在人类认

知过程中的积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柯文似乎相信，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中国不论从“纵向”或“横向”剖析，都是分解得越细越好。“即使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大堆农民”。“在等级结构的每一层次，直到最低层……都有社会阶层的区分”。(P. 152—153)他认为像希拉里·贝蒂(Hilary Beattie)一类的对县级地区的研究，将“指引我们如何最后就中国上层社会做出更加复杂的，更有区别的——因此不是那末笼统的——陈述”。(P. 149)他似乎深信“将人类历史的最细小的事实集合起来最后就会说明问题”。^[5]英国史家杰弗里·巴拉克劳(Geoffrey Barraclough)在论及美国新经济史家与新人口史家写出的大量微观研究时，曾警告大家：“正如老的实证主义者认为‘历史的事实’一旦为史家收集，就会无形中嵌入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正确模式的想法，最后证明是一种假象一样，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人口史家与‘历史计量学家’们(Cliometricians)的辛勤努力将在大量支离破碎的研究中白白浪费掉，无法取得任何概括性的或最终的成果。”^[6]有些研究中国的美国史家如墨子刻和马若孟(Ramon Myers)已在抱怨目前“在训练美国史家时把历史领域分门别类，割裂起来，导致许多错误理解”，抱怨美国社会科学家“往往只研究中国社会中很有局限性的若干方面，集中研究地区、社团，而忽视了整个体制的演变”。他们严厉批评了柯文在书中热情赞扬的史坚雅(G. W. Skinner)的地区系统分析，指出他“忽视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官僚体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类的活动固然受地方风貌和地区性特有形态的影响，但同样也受整个文化总体的影响”。他们认为“为了使广阔无边的历史领域显出一定意义，仍然需要总括的模式作为分析事物的框架，以标示各个研究课题之间的关系”。^[7]早在廿年以前美国史家爱德华·萨维斯(Edward

Saveth)就曾问道：“对微观单位的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更广阔领域的研究的线索？”“目前盛行的对微观单位的强调是否就是通向知识的道路？”^{〔8〕}且不管这些史家的总括模式是什么，他们指出美国史学界过分侧重精细化的偏向是有一定根据的。看来，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只有在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同时并举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

在“区分”之外，另有一词更能表达中国中心观的核心涵义，即“内部取向”。柯文实际上赋与“内部取向”以三种涵义。第一种涵义主要是在第一章批判冲击—回应模式时使用的。在这里“内部”主要是用来说明历史研究的内容或课题，内部取向主要是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当费正清谈到“美国史家研究十九世纪中国有一种向‘内、外’两方面反复摆动的现象时”，(P. 85)他指的是史家研究的课题有时侧重内部问题，有时侧重外部问题。柯文在第一章结尾时建议研究中国近代史应分最外层带、中间层带和最内层带时，用的也是此义。

内部取向的第二种涵义是当柯文在第二章开始批判传统—近代模式时才逐渐突出的，这时“内部”较多的是用来说明推动历史演变的动力来自何方。内部取向是指认为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自内部因素的看法。按此看法“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P. 76)

内部取向的第三种涵义主要是柯文在第四章正面界说中国中

心观时才着重使用的。这时“内部”多用来说明史家探索历史现象时采取的角度。内部取向是指从有别于“局外人”的“局内人”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是指“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其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序言 P. 6)事实上,它是指下文即将讨论的“移情方法”(empathetic method)。^[9]由于内部取向的这三种涵义是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的,柯文并没有把它们明确地区别开来,但是这种区别对分析、理解中国中心观的本质是十分必要的。

在说明什么是中国中心观时,柯文强调“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着手”。(P. 135)这一简要界说,特别是“中国史境”和“中国问题”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触及中国中心观的核心,值得仔细分析。

“中国史境”一词,这里显然是作为“西方冲击”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指一种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尽管外来的影响在不断加强。柯文强调说:“中国中心观取向想概括的思想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但它也制造了一个新的情境(context)……但是,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PP. 173—174)在另一处柯文说得更形象些:“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 line),他们奇妙地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条主线,而且在 1800 或 1840 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